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唐代景教文献研究

Studying o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聂志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代景教文献研究

Studying o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聂志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景教文献研究 / 聂志军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513 - 0

I. ①唐… II. ①聂… III. ①景教—文献—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88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同 萃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五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一) 编委会

主任：王京清

副主任：马援 张冠梓 俞家栋 夏文峰

秘书长：张国春 邱春雷 刘连军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方 勇	王 巍	王利明	王国刚	王建朗	邓纯东
史 丹	刘 伟	刘丹青	孙壮志	朱光磊	吴白乙	吴振武
张 翼	张车伟	张世贤	张宇燕	张伯里	张星星	张顺洪
李 平	李 林	李永全	李向阳	李国强	杨 光	杨 忠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陈春声	卓新平	房 宁	罗卫东
郑秉文	赵天晓	赵剑英	高 洪	高培勇	曹卫东	曹宏举
黄 平	朝戈金	谢地坤	谢红星	谢寿光	谢维和	裴长洪
潘家华	冀祥德	魏后凯				

(二) 编辑部（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张国春（兼）

副主任：刘丹华 曲建君 李晓琳 陈 颖 薛万里

成员：王 芳 王 琪 刘 杰 孙大伟 宋 娜 苑淑娅 姚冬梅
郝 丽 梅 枚 章 瑾

序 言

博士后制度在我国落地生根已逾 30 年，已经成为国家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30 多年来，博士后制度对推动我国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自 1986 年 1 月开始招收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起，截至目前，国家已累计招收 14 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大多成为各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这其中，已有 50 余位博士后当选两院院士；众多博士后入选各类人才计划，其中，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年入选率达 34.3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率平均达 21.04%，教育部“长江学者”入选率平均达 10% 左右。

2015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各设站单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博士后事业科学发展。这为我国博士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

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为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创新积极性，展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整体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联合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博士后成果。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库》已经成为集中、系统、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优秀成果的高端学术平台，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逐年提高。

下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做好《文库》工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锐意创新、发奋进取。为此，需做到：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实践结合起来，愈来愈显示出更加强大的



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应该更加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继续把《文库》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展示、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二，逐步树立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回答时代命题、规划未来道路的使命。当前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愈发重视，尤其是提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从 2015 年开始，中央已启动了国家高端智库的建设，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针对性要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文库》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的博士后征集优秀成果，入选出版的著作也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因此，要善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大智库功能与《文库》的小智库功能结合起来，进而以智库意识推动品牌意识建设，最终树立《文库》的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

第三，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里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缺失和建设问

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然是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和学科等组成。这一切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参考我们民族特质、历史智慧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吸纳儒、释、道、墨、名、法、农、杂、兵等各家学说的精髓，无疑是保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重要保证。换言之，不能站在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立场搞研究。要通过《文库》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一方面，要以中国自己的实践为研究定位，围绕中国自己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探索具备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在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方面，不断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衷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者和博士后们，以《文库》系列著作的出版为契机，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本遵循，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的召唤结合起来，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6年12月1日

摘要

本书旨在通过对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校注，扫清文字的障碍，加深词义的理解，有助于正确理解景教的教义，纠正前人对于景教文献的误解误释。在此基础上，证之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域外宗教文献，探讨景教与其它宗教的融合，审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策略，搜寻有名有姓的景教奉教者，有助于廓清景教在中国的流布，完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

本书分为五章，依次为唐代景教文献文字研究、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唐代景教文献核心术语考释、唐代景教文献史实考证、唐代景教文献整理相关问题研究。其主要特色为：

1. 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前人，大胆质疑，匡正谬误。唐代景教文献从明末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以后，中外学者李之藻、阳玛诺、伯希和、冯承钧、佐伯好郎、羽田亨、陈垣、穆尔、林悟殊、翁少军等人从景教核心教义的考证、文本的释读、传播的手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由于语料的限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披露与发掘，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深入，若干疑难问题得以解决，唐代景教史与景教研究史需要重新审视。本书多数论文都是在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通过补充新材料，利用新方法重新进行论证，取得了显著成果。

2. 学科综合研究效果明显。以往的研究者，学科背景以历史学、宗教学居多，在唐代景教历史的挖掘、教义的阐释方面有突出成果。但是，由于缺乏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景教文本（石刻和写经）的解读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是比较低级的错误，导致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出现

问题。本书多数论文都是从语言学角度切入，回归文本，对唐代景教文献中的疑难俗字、讹误字进行识认与考证，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唐代；景教；文献；词语

Abstract

This book aims to clear the characters barri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word meaning,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Nestorian doctrine, and correct the previous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employ about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through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handed? down literature,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and foreign religious literature, we can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Nestorian religion and other religions, examine the strategy in the spread of China Nestorian religion, and look for named Nestorian Christian,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clearance the spread of Nestorian religion in China, perfect the sprea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followed by Chinese? character? studying o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words studying o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core terminology studying o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studying on arrangement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Its main feature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is not superstitious about authority, not blind faith of predecessors, questioning boldly, and correcting fallacy. After the Nestorian tablet unearthed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in Xi'an, studying o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Nestorian core doctrine of textual research, text 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means and other aspects, has made a lot of results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such as Li Zhizao, Emmanuel Diaz, Paul Pelliot, Feng Chengjun, Saeki Yoshiro, and Hata Ryo, Chen Yuan,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Lin Wushu, Weng Shaoju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rpu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 disclosure and excavation,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deeply,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are solve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estorian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Nestorian of Tang dynasty need to review. Most of the papers in this book have been revised on the base of the conclusions of previous studies, new materials added, the use of new method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Secondly,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s obvious. There ar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mi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Nestorian religion of Tang dynasty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cademic background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rs are history and religion. However, due to lack of knowledge of character learning,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storian religion texts (stone carving and sutra) in different degrees. Some of them are even low-level mistakes, and cause problems with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Most papers of this book are starting to return to the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and it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iming at the difficult folk characters and misused characters to recogni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Dynasty; Nestorian; Literature; Words

前　　言

一 唐代景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在当下中国，除了极少数专家学者，人们对于景教的了解可以说是极为缺乏的，以至于向人介绍时，往往会多费一番周折，效果还不一定理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景教流传下来的典籍数量较少，并且曾经被禁断，因而对后世中国影响甚小。

其实，景教是指罗马教会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该教派创始于公元498年前后的波斯帝国境内，教名源于创始人——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rius）。聂氏因竭力倡导基督“二位二性”说和“玛利亚人母而非神母”说，从而使自身及教派背上了“异端”的臭名，付出了破门的代价。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一路东渐，最终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

此后的两百多年，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初步成功，与祆教、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公元845年，唐武宗开启的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夷教。景教与祆教、摩尼教，在会昌一役后走向式微。

景教是“聂斯脱利派”的中国名称，其得名来源于唐建中二年（781）景教徒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碑文有相关内容：“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①此碑后来不知何因埋入地下，于明代天启三年或五年（1623或1625）在西安出土之后，

^① 此碑为唐代景教土景净撰文，吕秀岩刻石。碑文为楷书体，碑体为竖方形，高279厘米，宽99厘米。刻32行，每行62字。碑额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上三角处莲花座上刻十字架，左右配以云纹花草纹饰。形制由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构成。此碑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二室。

这一宗教即被称为景教。虽然景教在中国传播有过 200 多年的辉煌，但是在后世典籍中却一直只有零星记载，真实面貌反而很少为人所知。对唐代景教文献的研究，肇始于明代晚期景教碑出土之后，按照研究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明代天启三年或五年（1623 或 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至清末敦煌藏经洞景教写经 P.3847 发现（1908）。在这将近 300 年的时间里，由于研究对象的唯一性，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景教碑》展开的，研究人员主要包括中国的奉教人士，例如李之藻、徐光启等，以及西方的传教士，例如，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法国人方德望（Etiene Le Fevre, 1598—1659）、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 1616—1659）、葡萄牙人鲁德昭（Alvarea Semedo, 1585—1656）、葡萄牙人阳玛诺（Emmanuel Diza, 1574—1659），研究的中心显然在欧洲。林悟殊的《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与耿昇的《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两篇论文对景教碑 300 余年学术史作了详细述评。^① 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证明中国景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根据碑文内容与基督教教义进行比附以及把碑文进行英译，好向欧洲展示唐代景教的面貌。但是一些重要问题反而被忽视，例如《景教碑》出土的时间、地点、建碑的原因，都缺乏明确的记载，至今都没有定论，详见伯希和、穆尔、冯承钧、洪业、佐伯好郎、岑仲勉、周祯祥等前贤的著述。^②

第二时期，清末敦煌藏经洞景教写经 P.3847 发现（1908）至河南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出土（2006）。随着敦煌景教写经 P.3847 的发现，后来又陆续有一批景教写经面世，目前得到学界认可的有《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等。在这将近 100 年的时间里，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这些景教写经展开，早期陈

^①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6 页；耿昇：《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世界宗教学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② [法] 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中华书局 1962 年版；[英] 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蒋本良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冯承钧：《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洪业：《驳景教碑出土于周至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2 年第 4 期；[日]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 1935 年版；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周祯祥：《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文博》1994 年第 5 期。



垣、罗振玉、许地山、樊炳清等中国人参与了敦煌景教写经的刊布与研究工作。此后由于相当一部分景教写经流入日本，研究中心自然转到日本，研究人员主要是日本人羽田亨、佐伯好郎等。

第三时期，河南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出土（2006）至今。经幢出土以后，国内专家张乃翥、冯其庸、罗炤、林悟殊相继发表相关文章，对经幢的形制、内容进行了介绍和披露，特别是把经幢所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洛阳本）与敦煌现存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敦煌本）合校，得到了目前最为完整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并且证明了“小岛文书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伪经，这可谓21世纪景教研究的世界级发现之一。^① 到目前为止，可能囿于材料的限制，还未见国外学者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现，研究中心自然也就是中国了。

在以上三个时期中，其中第二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又最多，许多困扰后人的难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20世纪早期的穆尔、佐伯好郎，中期的冯承钧、龚天民、罗香林、江文汉、朱谦之，及最近的荣新江、林悟殊，都是相当重要的学者。

穆尔的《公元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对于唐代的景教历史只有简单的论述，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景教碑文《三威蒙度赞》翻译成英文，且加以注释。佐伯好郎的《中国の景教》，对于各个景教经典都能兼顾历史考证、语言研究与思想探讨三方面进行研究，且分别进行英译的工作。冯承钧的《景教碑考》，则从各个观点与层面，对景教碑作一全面性的历史考据研究，不仅援引在他之前的诸位学者的相关文本，并加以按语，可使读者对景教碑有一历史性的认识。龚天民的《唐代基督教之研究》，对于唐代景教历史与经典的介绍相当概略，反倒是花了许多力气讨论景教文献与佛教语言的纠缠问题。罗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②，序篇论述唐元二代的景教历史与遗物问题，上篇针对唐代历史上的几个不太明显的资料，深入追索其中与景教有关的历史意义。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

^① 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冯其庸：《〈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中国宗教》2007年第11期；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第6期；林悟殊、殷小平：《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② 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

督教及开封犹太人》^① 既有对唐代景教清楚的历史考察，又把掌握的研究材料都作为《附录》列进去，避免了后人搜集资料的许多麻烦。另外一本不可忽视的著作就是朱谦之的《中国景教》^②，不但详加说明景教在基督教历史的沿革，而且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与唐代其他宗教的关系均有所涉及，让读者对景教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荣新江的《鸣沙集》从敦煌学的观点，对景教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其中与林悟殊合著的《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与他自著的《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两篇论文，对于所谓的“小岛文书 B”有关键性的证伪考证。至于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当属林悟殊的《唐代景教再研究》，该书分为两部分：一是传播篇，主要针对景教寺院的考证与其宣教策略问题——特别是后者能够扩大视野，从唐代三夷教的比较研究入手，让景教宣教的历史参考架构更加清楚；二是经文篇，针对所谓敦煌出土的经文进行考证工作。

以上是 400 年来唐代景教文献研究的一个大概脉络，其中欧洲传教士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可以说各自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研究水平，对《景教碑》的介绍、碑文的解释和对敦煌景教写经的整理、校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但是，欧洲传教士和日本学者尽管都是颇有名望的汉学家，却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存在，那就是作为域外学者，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对于唐代景教文献文本本身的理解毕竟不是那么到位，存在一定的误区。在对文本语言本身，特别是其中一些涉及历史背景，涉及今典、古典的疑难问题，在没有吃透中文文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英译和研究，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国内的历史文物学家、宗教学家，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不同，他们感兴趣的是景教的沿革、传入途径、传播的策略以及与本土宗教的融合与交融，而这些研究可以建立在对景教文献的核心词汇理解的基础上，即使对景教文献文本文字并没有理解透彻也无伤大雅。因此，目前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是极为薄弱的，没有一个完整、权威的注释版本可以利用，并且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有些曾经被认为是景教文献的写经已经被证明是“伪经”（如上文提到的“小岛文书 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前人囿于条件的限制，把这些“伪经”当作景教文献，现在迫切需要加以剔除，以正视听。

① 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



造成这样的现状当然不能苛求欧洲传教士、日本学者和国内的专家学者，正是他们对于景教的大力弘扬，才有今天景教在世界宗教史的地位。但是，国内语言学家在唐代景教文献研究中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对唐代景教文献进行详细注释的著作是翁绍军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但是由于不是专业的注释著作，该书在导论部分花了很大篇幅进行“汉语景教文典的思想内容和传输类型”的介绍，并且也包括了前文提到的“伪经”（“小岛文书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即使在注释部分，相当一部分注释是取自前人成说，鲜有创见，并且很多注释都是不注出处、不引例句，主观性、随意性极为明显。王绍峰在《〈汉语景教文典诠释〉指谬》一文中对翁绍军的22处校诂提出了新的解释。^①林悟殊在《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中对此的评价是“翁本虽较为详细，但不乏‘硬伤’”^②。其他的学者，大多只是在考证景教的历史、教义及其真伪的时候顺带考释个别词语，散见于各种唐代景教研究文章中，缺乏系统的研究。况且从唐代景教文献本身来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然已经不存在真伪的问题了，但是由于碑文内容文辞简约、典雅，疑难处尚多，可供挖掘的地方也就不胜枚举了；至于敦煌出土的景教写经，由于是抄本，讹误不少，《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的某些章节至今仍然句读困难、文义不通以及存在难以理解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唐代景教文献进行全面详细的注释、校对，对景教文献文本本身的疑难之处进行解释，对欧洲传教士和日本学者英译带来的错误以及国内学者自身研究带来的误解进行纠正，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 唐代景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对象

唐代景教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流行200多年的外来宗教，其真实面貌之所以一直不为后人所知，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作为唐武宗“会昌灭佛”（845）的连带牺牲者，景教保留下来的典籍确实太少。在明天启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之前，由于文献相对缺乏，对于唐代景教的研究唯有从历史典籍（如《唐会要》等）中捕捉到一些零星的线

^① 王绍峰：《〈汉语景教文典诠释〉指谬》，《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

^②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